

詹姆斯·鲍德温的历史观研究 ——以《查理先生的布鲁斯》为例

宓芬芳

(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杭州 310053)

摘要: 美国非裔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着眼于美国种族历史与社会现状, 主张文学利用历史创造现在。从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角度分析其戏剧《查理先生的布鲁斯》, 研究其文学中的历史与文本的互动关系, 探讨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 有利于梳理鲍德温的历史观。鲍德温一方面通过设计独特的时代背景、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将美国种族历史文本化, 再现暴虐的种族仇恨历史, 揭示种族主义历史和白人的无知是种族仇恨的根源; 另一方面, 通过设计别具一格的剧本名称和与众不同的人物形象, 利用文本创造历史, 强调种族仇恨的受害者并非只是黑人本身, 而是所有的美国人, 呼吁黑人与白人像兄弟那样团结起来以摆脱种族仇恨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关键词: 詹姆斯·鲍德温; 《查理先生的布鲁斯》; 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 I 712.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7)03-0252-05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7.03.010

A Study of James Baldwin's Historical Conception: —Take *Blues for Mister Charlie* as an example

Mi Fenf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3, China)

Abstract: The African American writer, James Baldwin based his writings on American racial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social situation, advocated that writers should make use of history to create the present. This paper, with the guidance of New Historicism theory, studies the interaction of history and text in James Baldwin's writings by analyzing his play *Blues for Mister Charlie*, thus decoding Baldwin's perception of history thoroughly. Baldwin, on the one hand, designed the American racial history by creating unique historical background, plot and characters to show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cial hatred, emphasizing that the racial hatred derived from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cism and the ignorance of the white. On the other hand, with a special title of the play and vivid characters, he enlightened the world that the victims of racial hatred were not solely the black themselves but all the Americans, so the black and the white should unite together to get rid of the destructive and fatal consequence of racial hatred.

Keywords: James Baldwin; *Blues for Mister Charlie*; historical conception

收稿日期: 2016-03-15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课题(2015B098);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Z16JC045)

作者简介: 宓芬芳(1982-), 女, 讲师。研究方向: 美国文学。E-mail: fenfangmi1982@163.com

美国非裔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不仅是一位语言犀利、思想深邃的散文家、社会评论家，也是善于把握时代脉搏、驾驭故事情节、展现人物个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充分展示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多样化的“文化内容”和独特的“种族抗议”，颇受海内外读者的关注^[1]。

学术界对鲍德温文学关注已久，但主要的学术性研究集中于其文本体现的种族观、黑人文化、伦理思想、父子关系等四个方面。现有研究对鲍德温文学中的历史内容略有涉及，但是对其文学中的历史文本性和文本历史性问题的整体探讨不够，这正是本文的切入点。本文拟以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为指导，以戏剧《查理先生的布鲁斯》（*Blues for Mister Charlie*, 1964）中的历史与文本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鲍德温文学的历史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从而对鲍德温的历史观进行梳理。

一、历史的文本性：展演种族仇恨及其内因

新历史主义批评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一种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强调文学本体论的批评思潮的反拨，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指出文学与历史之间不存在前景与背景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和影响。历史是文本，文本是历史，即“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

“历史的文本性”是指文本不仅展示了一个社会真实、完整的历史，而且不可避免地渗透作家的主观性^[2]。就鲍德温看来，美国黑人历史是美国种族矛盾的病根，因此也就成了改善种族关系的良方。在他与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ret Mead）的对话中，鲍德温高度肯定了历史的重要性：“我对于时间的观念是：我认为历史不是过去。如果它是过去，那么他将变得不重要……历史就是现在。你和我都是历史。我们被卷进历史的洪流。我们生活在历史中。”^[3]¹⁸⁸鲍德温始终认为只有当美国白人学会尊重历史，美国社会才能走出种族矛盾的困境。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是矫正形式主义等文学批评中非历史化的弊端，恢复文学研究中的历

史纬度。文本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基于特定“性别、种族和阶级之类权利等级制度”的历史语境，它一定程度上“控制作家的意志”，从而使文学具有“颠覆社会权威的力量”^[4]。20世纪中期，黑白种族关系紧张、谋杀私刑等事件频发，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查理先生的布鲁斯》的诞生，使鲍德温成为美国历史上“少数在百老汇上演一部以上剧本的著名黑人剧作家之一”，并于“1964年获得外国戏剧评论奖”^[5]。

该戏剧将黑人历史文本化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剧本以美国黑人民族的历史事件为创作素材，将1955年密西西比州一起真实的谋杀案栩栩如生地展现于文学文本。黑人男孩埃米特·提尔（Emmett Till）惨遭白人男子谋杀，谋杀犯因其兄长的袒护而被判无罪。之后，谋杀犯的兄长不但未因蒙蔽罪犯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被晋升为密西西比州鲁斯维尔（Rulesville）的副司法官。事后，谋杀犯向友人威廉姆·佑（William Huie）坦白了罪行，威廉姆把谋杀案件改写成故事并以《狼的啸叫》（*Wolf Whistle*）为题名公之于众。该案件犹如巨石坠落，使鲍德温感到震惊与愤恨，他在该剧本的前言中写道：“在生活中，我对这样的人充满疑惑和恐慌，有时候我恨之入骨，甚至想杀死他们。但是，有时候我却意识到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恶棍。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知道——或者肯定知道——他做了邪恶的事情；但是，他必须得到改变，才能接受这个事实。”^[6]^X

（2）鲍德温开启了一扇历史之窗，把读者暴露在种族仇恨肆虐的时代背景中。故事发生在黑白人口参半的美国南方小镇：小镇被一条羊肠通道分成两个独立的世界，即以教堂为标志性建筑的黑人镇与以法庭为象征性建筑的白人镇。教堂象征着虔诚祈祷但不得不生活在忧患中的黑人，而法庭则代表着虽任意迫害黑人，但受美国法律偏袒仍逍遥法外的白人。黑白种族隔离的生活环境暗示着美国黑白民族不可调和的生活现状和思想状态。

（3）鲍德温通过巧妙设计白人谋杀黑人的故事情节，再现了黑白种族水火不容的历史画面，这无疑为种族仇恨的罪魁祸首。一方面，血腥的种族主义历史把黑人和白人无情地暴露在仇恨火焰中。对于黑人来说，白人是罪恶的化身，他们自视清高、野蛮专横、傲慢无礼，暴虐黑人男性，霸占黑人女性。主人公黑人男子理查德对白人的感情亦是

如此。他对白人深恶痛绝,因为他们是杀害母亲的罪魁祸首,是他生活与事业的绊脚石。为了贬低白人,重塑黑人男性自尊,他随身携带白人女性的照片,炫耀与她们的性经历。当他来到白人莱尔的杂货铺买饮料时,他故意制造麻烦,让莱尔妻子找大额零钱,引发了他与莱尔的第一次肢体冲突。同样对于白人来说,黑人是恶棍的代名词,他们刻板腐朽、吸毒贩毒、打假斗殴、骚扰挑衅。白人往往将黑人的“性”魔鬼化,认为黑人具有超强性能力,致使他们害怕自己的女人被霸占,有损白人男性尊严。为此他们常常不择手段,迫害黑人男性、霸占黑人女性。因此,性骚扰也便成了莱尔及其妻子辩护自身暴力行径的根据。自从看到理查德和黑人女友乔安妮傲慢地跳舞的那一刻起,莱尔便对理查德心存仇恨。当理查德故意刁难他妻子时,莱尔对理查德的仇恨一触即发。他诬蔑理查德骚扰妻子,最后犯下了滔天罪行。另一方面,历史上美国法律对白人的偏袒包庇了白人的无知,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其实,莱尔早年前已经犯下谋杀黑人的罪孽,但美国法律听之任之,致使莱尔毫无悔改,再次犯罪。作为谋杀事件目击证人的莱尔妻子无视法律的威严,在法庭上公然作伪证,诬蔑理查德性骚扰。尽管她的口述前后不一致,但是法官却对此有意忽视。不公美国司法审判的历史无疑成了白人罪犯的庇护所,致使白人谋杀黑人的事件不绝于耳。

(4) 鲍德温通过塑造莱尔妻子等多位白人形象,强调白人对历史的无知加剧了种族仇恨。面对解放后黑人抗议无处不在的南方,白人总是怀念黑人逆来顺受的旧社会。莱尔妻子多次表达了对旧社会的留恋:“以前,这个小镇里,我从来没有如此害怕过。因为那时的黑人就像我们自己人一样。我从来都不知道有人虐待黑人……他们当然也不认为自己受到了虐待。”她的白人同伴也同样感慨:“这个小镇是怎么了?以前,我们都相处得很好,这里一片平静,我们没有任何麻烦。”“那时候的黑鬼是友好的,你总可以找到一个黑鬼来帮你抓到另外一个黑人。”^{[6]48-49}可见,白人始终没有认识到黑人人性,对黑人抗议的历史原因熟视无睹,这是美国种族关系最可怕的敌人。在其散文《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 1964)中,鲍德温愤怒地写道:“……我控诉我的国家和同胞们犯下的罪孽,时代、历史和我将永远都无法原谅他们。他们摧毁了,并且正在摧毁成千上万的生命,但是不知道这一切,甚至是不想去了解这一切……

无知导致罪恶。”^[7]鲍德温通过塑造莱尔妻子等白人形象,揭开了种族仇恨的面纱,强调种族主义历史与白人的无知是种族矛盾之根本。

总之,《查理先生的布鲁斯》通过改编历史性事件,设计别具一格的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展演了暴虐的种族仇恨,强调种族主义历史和白人的无知是种族仇恨的根源,全面体现了鲍德温对历史的文本化过程。但是再现历史不是鲍德温文学创作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鲍德温希望通过文本来影响美国种族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二、文本的历史性:探索种族关系的出路

“文本的历史性”是指一切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任何文本一经产生都是历史的;文本不仅是语言表述的载体,也参与了历史的构成。文学并不是被动地反映历史事实,而是通过文本对历史的重构施加影响。虽然鲍德温曾几度离开美国,流放法国、土耳其等国家,但是他始终铭记他的美国身份与作为美国黑人作家的历史使命。“历史就像梦魇——但是,可能没有人能够从噩梦中醒来。做梦人沉浸在历史中,历史萦绕着做梦人”^{[8]16}。因此,鲍德温相信人们“对过去的理解影响着未来”,“利用过去创造现在”也便成了他重要的文学创作理念^{[3]204}。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是跨学科研究性和文化的政治属性。文化的政治属性是指文学和文学史走出了象牙塔式的学院式研究,成为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力斗争、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的标本。文学通过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从而发现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异在的不安定因素,揭示这种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政治表达及其与权力话语的复杂关系^[9]。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曾指出:“不参与、不作判断、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10]这与鲍德温的“历史就是现在”“用历史文本改变现在”的创作思想不谋而合。在其散文集《土生子札记》(*Notes of Native Son*, 1955)中,鲍德温指出:“我认为,如果不把历史语境牢记在心,美国黑人问题甚至不可能得到连贯性的讨论。这个历史语境是指历史、

传统、习俗、道德规范以及国家的重要事物：即整个社会构成。”^[18]⁸《查理先生的布鲁斯》是鲍德温“利用历史、创造现在”创作理念最淋漓尽致的体现：既然美国种族矛盾的根源不是美国白人与黑人的可恶本性，而是美国黑人被奴役的丑恶历史与白人的无知，那么黑白种族就要相互团结，鼓励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黑人和白人领先站出来，引导黑人重塑自信，摆脱白人无知，最终达到民族融合。

(1) 鲍德温把目光投向白人自由主义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剧本别具特色的命名。剧本名称《查理先生的布鲁斯》中的查理先生不是剧本的主人公，甚至不是剧本人物，而是指涉所有的美国白人。理查德的父亲梅瑞德在与帕内尔的对话中指出：“这种挣扎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查理先生不改变，那么希望会在哪里？……所有美国白人都是查理先生。”^[6]⁴⁰可见，该剧本是一首为美国白人吟唱的忧伤布鲁斯，鲍德温希望通过这首布鲁斯唤起美国白人的良知和责任心。鲍德温认为黑白种族仇恨的最终受害者不只有黑人，也包括所有的白人。白人老一辈为夺取利益、维持白人尊严，给后辈留下了仇恨的烙印，这与自取灭亡毫无差别，因此值得同情和悲哀。鲍德温这以观点在剧本的前言中得到了详细的阐释：

“……我相信所有人们都是兄弟，因此，我们（美国人）有责任去理解这个可怜的人（白人谋杀犯）。尽管我们可能没有希望去解放他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从解放他的孩子开始努力。因为是我们，这些美国人，造就了他，他是我们的奴隶；是我们把赶牛棒硬塞到他的手里，我们要对他犯下的罪孽负责。是我们把他锁进了肤色的牢笼，是我们告诉他黑人是无用的人种，告诉他，身为白人，维护种族的尊严和纯洁是他神圣的使命。最初的他 and 黑人们互爱互敬，同享快乐，利用他们，是我们阻止他接受这个最初的自己，让他们承受被排除在黑人种族之外的痛苦；是我们使他们认为白人父亲否认黑人儿子是必要的、值得尊敬的。这些都是严重的罪孽，为了财富，我们已经犯下了罪孽，并且继续着。”^[6]^X

可见，鲍德温认为美国种族矛盾并非是黑人或者白人单方面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所有美国人的共同努力。这是鲍德温在种族问题思考上的独特见解，体现了他深刻、豁达、包容的思想。既然黑人和白人是兄弟而种族仇恨的罪魁祸首是黑人被奴役的历史和白人的无知，那么黑人和白人就应该相互

理解，共创未来。

另一方面则是白人自由主义者帕内尔的人物形象塑造。帕内尔是正义与公平的象征，是黑人与白人的沟通桥梁：他尊重黑人女性，痛恨玷污她们的白人男性，虽然他迫于舆论未与黑人女友结为连理，但是他敢于承认对她的爱情；他主张黑白孩子就读同一学校，接受平等教育，甚至建议莱尔把女儿送到他曾就读的瑞典黑人学校；他还主张黑人和白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被问及“莱尔庭审时是否需要黑人参加”的问题时，帕内尔坚定地回答：“是的……小镇上44%的人口都是黑人，所以毫无疑问，黑人必须被邀请参加法庭的审判”^[6]⁵⁷；他顶着“混淆种族”的骂名，坚持“社会公平”，强调“（社会公平）意味着如果我是拥有一百美元的黑人，而你是拥有一百美元的白人，我应该为我的一百美元——我的一百美元——获得与你的一百美元同样价值的东西。同样，我应该有同等机会去赚取那一百美元”^[6]⁵⁴。然而，鲍德温也从未忽视白人自由主义者畏首畏尾、优柔寡断的一面。虽然帕内尔对该案件愤愤不平，但是他在挖掘事情真相的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在说服莱尔说出真相的过程中缺乏挑战力。他曾坦言：“越过种族隔离这座围墙、放弃所有的一切、交出特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一切是你的一部分，是你身份的体现……埋藏于你身体的深处。”^[6]⁴⁰尽管帕内尔身上存在一定软弱性和不彻底性，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理查德案件的失败，但是鲍德温仍然积极肯定了他作为黑人与白人间桥梁的作用。审判宣告莱尔无罪，愤怒的帕内尔决定继续与黑人上街游行。当帕内尔问理查德女友乔安妮塔能否加入黑人游行队伍时，乔安妮塔同意说道：“可以，我们可以向同一个方向前进。”这里的“同一个方向”象征着黑人和白人对种族平等的共同追求。可见，鲍德温在强调白人自由主义者是推动黑人民权运动的重要力量的同时，始终没有忽视对他们的软弱性与不彻底性的批判与鞭策。

(2) 鲍德温始终认为改变黑人命运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白人的改变，而是应该依靠黑人的自身力量。黑人牧师梅瑞德就是鲍德温笔下的重要黑人代表。尽管梅瑞德为儿子理查德的死亡悲痛不已，对谋杀犯深恶痛绝，对帕内尔是否能帮助指证谋杀犯不确定，但是他仍然教育族人要对像帕内尔那样的白人多一份信任、理解和宽容。他总对黑人城的人们说：“帕内尔会帮助我们……他是这个小镇里唯

一为公正赴汤蹈火的白人。他为开庭审判案件做出了很多努力——我没办法告诉你他做这件事有多难。如果没有他的帮助,事情将会更加没有希望。”^{[6]5}此外,他还深藏失妻之痛苦,劝慰理查德放下仇恨好好生活。剧本不惜笔墨,用大量文字记录梅瑞德的冗长布道:

“上帝啊!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有谁,有什么能触碰这些鲁莽、无知的人,阻止他们走向灭亡?……如今,当孩子们,上帝啊,问我他们该何去何从时,我的舌头结巴了,我的心崩溃了。我不会放弃这片土地——这是片神奇的土地,是我的家。但是,我怎么能让我的孩子永远承受这样的折磨?这些迫害他们的人,过去曾是他们的主人,而事实上,现在是他们的亲人、兄弟、姐妹和父母。对于打着纯洁、爱的幌子,借耶稣的名义否认自己的行为,遗弃自己亲人的民族来说,希望是什么?……上帝,请教导我们相信生命的天赋,学会爱,敢于像人一样在地球上自由自在地生活。”^{[6]77}

通过梅瑞德的布道,鲍德温表达了他对种族关系问题的思考,并提出:一个问题——美国人该如何对待种族问题?一个事实——美国黑人和白人是亲人、兄弟和姐妹;一个教训——如果白人继续无视自己的过错,否认自己的亲人,那么下一次将是烈火;一个建议——人们应该相信生命的力量,互爱互助,自由自在地生活。鲍德温指出:“没有黑人,白人不能真正地生存在这片土地上……不管他们是否承认这一事实,我们是他们的兄弟——这并不只是说所有人都是兄弟的套话,而是我们因为血统关系真正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不知不觉地决定着很多方面。”^{[3]65}鲍德温借梅瑞德之口向世人传播爱的福音:如果黑人树立自信,学会理解白人,白人摆脱无知,学会尊重黑人,那么种族融合指日可待。

当谋杀犯被宣告无罪释放时,梅瑞德对美国社会感到无比失望。此时,他扮演预言家的角色说道:“(种族仇恨)因圣经和手枪开始,也许也会因此而结束。”^{[6]120}圣经象征白人奴役黑人的封建教条,而手枪则象征着白人对黑人的暴力统治力量。如果美国白人继续以封建的教条和残酷的暴力控制黑人,那么他们就会自取灭亡。

通过独具设计感的剧本名和复杂人物形象的塑造,鲍德温启示世人种族仇恨的受害者是所有的美国人,而只有当白人和黑人像兄弟一样团结起来,才能摆脱种族仇恨带来的致命后果,这就是鲍德温

文学利用过去创造现在与未来的文本历史化过程。

三、结束语

文学是人性重塑的心灵史,是对于复杂斗争与文化和谐极为敏感的记录,它通过再现历史,将社会能量表现、传播,并影响观众,从而达到变革社会。《查理先生的布鲁斯》揭开了美国社会极为敏感的种族矛盾,用直观的方式暴露种族关系的血腥与暴力,以至于诸多读者、观众和评论家认为该剧表达了一种可怕的仇恨,不但无法和解矛盾,而且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鲍德温为此申辩道:“我认为剧本体现的问题不是仇恨……这可能是历史。”^{[3]35}诚然,鲍德温勇敢直面血腥的种族主义历史,揭示种族历史与白人无知是种族仇恨之根本;深入探讨种族仇恨的出路,强调其受害者是所有的美国人,呼吁黑白种族相互团结以摆脱种族仇恨。鲍德温对历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历史化过程是历史与文学相互呼应和相互激发的过程,呼应了他牢记历史,利用历史创造现在的独特历史观。

参考文献:

- [1] King L, Scott L O. James Baldwin and Toni Morrison: Compa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1.
- [2] Montrose L A.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 [M]. Veese H A. The New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89: 19 - 20.
- [3] Baldwin J, Mead M. A Rape On Race [M].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71.
- [4] 孟庆枢, 杨守森. 西方文论 [M]. 第二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 [5] Standley F L. James Baldwin as Dramatist [M]. Standley F L, Burt N V. Critical Essays on James Baldwin. Boston: G. K. Hall, 1998: 298 - 302.
- [6] Baldwin J. Blues for Mister Charlie: A Play [M]. New York: Dial Press, 1964.
- [7] Baldwin J. The Fire Next Time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4.
- [8] Baldwin J. Notes of a Native Son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 [9]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类理论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10] 格林布拉特. 回声与惊叹 [C] // 皮特·科利. 当代文学理论. 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90: 20 - 74.

(编辑: 巩红晓)